

美国的当代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

祁永芳

摘要:新时期以来,对于美国的文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一直没有中断且成绩斐然,对于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美国学界采用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进行文学研究这一现象却鲜有提及。在主张文学研究多元化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对美国学界采用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梳理,总结并介绍了此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打破了文学与现实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发掘出了二者之间彼此影响的关系,并对文学和文学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指出了文学的独特功能:探索可能世界,为人类的进化寻找方向;而文学研究也由此获得了一个作为文化的创新之源而独有的面向未来的实践性维度。

关键词: 美国; 当代文学研究; 自然科学

作者简介: 祁永芳,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电子邮箱: joseyhz@126.com

Title: American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and Natural Science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delineating how the American literary research has adopted the methods traditionally applied in natural sciences and analyzing its achievements. The paper claims that the adoption of natural science methods in literary studies has the following main achievements. When the dichotomy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 is undermined,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m can be realized, and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the scope of literary studies can be re-defined. The unique nature of literature has been highlighted to explore all possible dimensions of the world for the seeking the evolutionary direction for human being, while literary studies take on a future-oriented dimension of practice.

Keywords: American;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natural sciences

Author: **Qi Yongfang** teaches in Zhijiang Colleg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4, China) ,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ie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Joseyhz@126.com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文学研究界,符号学、形式主义及结构主义等流派互相竞争,呈现出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新时期以来,由于文艺学界的大力译介及推广,上述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在中国文艺学界大多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事实上,在当时甚至更早些时候,美国的文学研究界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与上述流派迥然有别的方式在进行文学研究,此类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并且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现在。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

界对此类研究所做的介绍还远远不够。

—

美国的文学研究界引入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的做法是文学研究多元格局中不容忽视的一元。其形成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合力的作用:一是美国政府对交叉学科研究的大力支持;二是思想界促成文学与科学两种文化融合的努力;三是文学创作实践及文学批评的需要。

美国政府对学科交叉研究十分重视,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文学研究界对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的引进。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以及其他一些机构都围绕着学科交叉研究制定资助计划。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出现了许多独立的跨学科学术机构。这些机构聚焦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共同进行研究,因而其研究能得到政府及社会上其他基金组织的资助。美国一部分著名作家有在此类机构工作的经历,如鲍尔斯曾经在伊利诺伊大学高级科学研究促进中心贝克曼研究所工作过,麦卡锡是圣塔菲研究所的一员。这样的工作经历势必使他们在创作中引入一些自己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理论或知识,因而对其作品的研究也相应地需要一种跨学科视野。

弥补文学与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也是美国的文学研究界引入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的主要动力之一。虽然美国早在1783年就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了,但是在文化方面还是深受其母体的影响。因此不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识之士普及科学的传统,还是发端于英国的关于科学与文学两种文化的讨论,对美国思想界都有一定的影响。科学与文学曾经和谐共存,但到十九世纪末,自然科学就初步形成了一套专业化的用语,普通人无法读懂科学家发表的作品,于是在文学与科学文化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斯诺撰写的《两种文化》就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文学与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两者之间的争议也愈演愈烈。最终由索卡尔诈文事件^①引发了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大战。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更好地促进文学与科学文化各自的发展,知识分子开始采取不同的措施来促成文学与科学这两种文化的融合。采用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就是措施之一。

创新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对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的引入。创新精神是美国精神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不论是作家本身还是文学研究者都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几乎每十年文学艺术领域就会经历一次重大的改变,新流派、新主义不断出现。而美国当代作家知识背景的多元化则为他们在创作中进行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随着高等

教育的发达与普及,一部分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比较著名的如品钦;在交叉学科研究机构工作的经历及科普读物的大量出版使得文科背景的作家们也很容易就能了解到自然科学的最新动态。因此,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创作中大量引入自然科学的元素进行创新。既然文学艺术在不断创新,对其进行研究的方法当然也要尽可能创新。二战前,新批评派还可以称霸数十年。但在二战后的文学研究中,各种主义、流派层出不穷,彼此竞争,因而文学研究势必需要更多的思想资源进行创新,因此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就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二

在美国的文学研究中被借鉴的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种类繁多,绝大部分在自然科学史上具有改变世界观意义的理论,比如进化论、热力学及量子力学中的部分理论,还有信息论、系统论、混沌理论等,都有学者借鉴。鲍尔森的《文化的噪声:信息世界中的文学文本》(*The Noise of Culture: Literary Texts in a World of Information*) (1988)采用信息论分析了文学在当代社会中的独特价值;列克莱尔的《超常的艺术:美国当代小说中的经典》(*The Art of Excess: Master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1989)采用系统论对经典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苏珊·斯赫的《量子世界中的小说》(*Fiction in the Quantum Universe*) (1992)主要采用测不准原理对一些美国当代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中长篇小说进行了解读;迈克尔·H·惠特沃斯(Michael H. Whitworth)的《爱因斯坦的醒觉:相对论、暗喻和现代主义文学》(*Einstein's Wake: Relativity, Metaphor, and Modernist Literature*) (2001)探讨了现代主义文学与相对论之间的关系;海尔斯的《混沌的边界:当代文学与科学中有序的无序》(*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1990)采用混沌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在她之后,斯勒索(Gordon E. Slethaug)在其专著《美丽的混沌:美国当代小说中的混沌理论与元混沌学》(*Beautiful Chaos: Chaos Theory and Metachaoitics in Recent American Fiction*) (2000)中,分析了混沌理论与美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约瑟夫·M.康特(Joseph M.

Conte) 出版了《设计与残骸: 后现代美国小说中的混沌学》(*Design and Debris: A Chaotics of 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 (2002) 。可以说, “混沌理论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理论热潮, 而是一种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仍魅力不减的文学批评视角” (陈爱华 139) 。当然采用其他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所进行的研究也一直持续到今天。^② 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一特定的学科角度进行文学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威尔森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学艺术进行的研究, 伦纳德从物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等。此类研究由于涉及到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的关系, 因而也是本文考察的对象。上述所有研究均从不同的方面给美国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

文学与现实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打破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美学中一个历史久远而又争议较大的问题, 从摹仿说到表现说, 无一不是这一争论的反映。在所有这些争论的背后起作用的都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基于这种思维方式, 文学要么是对于现实的或忠实或不忠实的反应, 要么是对现实的主观表述, 要么与现实无涉。如果文学只是为了忠实地再现现实, 那么已经有现实了, 还要文学干什么? 如果文学是对现实的加工和改造, 那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如果文学与现实毫无关系,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所有这些问题纠缠不清, 难以回答。如果只是从文学自身出发去研究, 上述困境当然无法避免。威尔森和伦纳德另辟蹊径, 分别从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解读文学, 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解读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视角。

文学是一种开拓可能现实的手段。虽然在摹仿说和表现说中, 文学艺术世界与现存现实的差异程度有大有小, 但都有意或无意地创立出了一个不同于现存现实的世界。也就是说, 文学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世界还有哪些可能的方式, 这一点对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人类要想在地球上更好地生存, 势必要进行发展与变异, 因此就需要足够多的可能的现实供人类选择, 文学所创造的世界恰恰为人类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案。由于文学不需要像科学那样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解释, 因而在开拓可能世界时更为高效、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学与现实之间就不再是一种

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 而是彼此介入、相互影响。文学不再是镜子, 而是触角, “开始于真实的世界, 然后到达可能的世界, 最终到达所有可以被构想的世界” (Wilson 220) 。文学所创造的每一个可能世界都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可能的方向, 文学将与人类共始终,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采用不同的探索可能世界的方式。

威尔森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对文学进行的解读指出了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 探索可能世界, 为人类的进化寻找方向。如此一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文学会通过改变形式而改变探索的方式, 却不会消失。这一解读不仅发掘出了文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崭新的角色, 而且赋予其一个面向未来的、较为乐观的维度。但是威尔森从生物学的视角进行的探索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比如常常用经验实证的方式来解决, 并且试图从大脑的物质构成的角度来解释文学艺术, 这一做法无疑有一种试图用生物学来统括其他一切学科的倾向, 未能顾及到学科的独立性, 因而应当受到必要的抑制。

文学开创可能现实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创立一种新的理解时间和空间的方式。艺术要么是时间的, 要么是空间的, 要么是时空的, 因此艺术的创新必然要涉及到时间或者空间的创新, 或兼有二者。与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相比, 文学不需要任何物质材料, 因而在创立一种新的时空方面有着更为灵活的优势。1857 年福楼拜创作了《包法利夫人》, 该小说的开篇第一句采用了复数人称的叙述方式, 等于向全世界发出了整个西方文明中的单一视点和优势参考系已经需要变革的信号, 是对欧几里德时空的挑战。这一点并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 要等若干年后由爱因斯坦用公式表达出来才会逐渐被世人接受。而爱因斯坦的探索也从文学中受益良多, 他晚年时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的影响超过所有的思想家, 也超过了高斯” (史莱茵 339)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段谈论第四个维度和非欧几何的话, 而爱因斯坦最喜欢的就是这部作品。

可以这样理解, 文学艺术凭直觉创造一个可能的世界, 这一世界对人类的意义不可低估, 它“造就了崭新的概念, 而这些当时尚处于语言前阶段的概念, 有行将改变一代文明的能力” (史莱茵 4) 。艺术正是处于福柯意义上的那个中介地

带的一种力量。每个人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由文化的基本代码所确立的经验秩序,这个经验秩序是一个人的思想的一端,而在另一端则是科学理论和哲学对这一经验秩序的阐释,但是在这两端之间还存在一个较为模糊、黯淡,并且不易分析的区域,但正是在这里,“因不知不觉地偏离了其基本代码为其规定的基本经验秩序,并开始与经验秩序相脱离,文化才使这些秩序放弃了自己即时的但不可见的力量,充分放纵自己确认,这些秩序也许不是唯一可能的或最好的秩序”(福柯8)。文学正是这样一种模糊而不易分析的力量,用风蚀的方式打破已经确立的经验秩序,设想出一个全新的尚不能用已有的概念来界定的世界图景,科学努力去创立一套清晰的描述这个新图景的语言,而人类生存的空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拓展,才有机会在各种可能的路径中选择最适合的那一条。

从文学艺术与物理学的关系出发解读前者开拓可能世界的方式,以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展现了文学对现实的介入和影响。遗憾的是史莱茵的研究忽略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人类的世界观并进而影响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面,也就是说,他忽略了艺术与物理学之间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苏珊在《量子世界中的小说》中对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彼此介入

在美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中涌现出了一批作品,它们与现实的关系与传统的摹仿或者表现迥然有别,偏离了现实主义传统,却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反映。在这些作品中,既有荒诞离奇的情节,也有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地点、人物以及事件高度吻合的描述,二者呈现出并置的局面,融艺术的虚构性与新闻的真实性于一体。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罗伯特·库伯(Robert Coover)的《公众的怒火》(The Public Burning)、威廉姆·甘地(William Gaddis)的《少年富豪》(JR)等。许多文学批评家纷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这些作品对待现实的态度,其中有一部分学者独辟蹊径,引入相关的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对这些作品进行研究,苏珊·斯赫就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位。她从量子理论、相对论、测不准原理等多种现代物理学理论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一个新

概念:主观真实主义(actualism)^③,以此描述上述作品所展示出来的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新型关系。

主观真实主义小说体现出对牛顿时空观及单一优势视点的惯性参考系的强烈的否定倾向,主要具有这样三个突出的特征:第一,舍弃全知叙述,而改为从一个或多个叙述者的主观立场进行叙述。在这种叙述模式中,作者放弃了传统的创作模式中惯常的全知全能的视角,进入自己的作品,但并不比自己笔下的人物叙述得更流利或者对故事的发展更确信;第二,质疑牛顿的时空观。虽然牛顿意义上的那个确定的时空观,通过教育、宣传等途径一再被强化,渗入了每一个人,其中也包括主观真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的血液中,但是当这些人物尝试着用牛顿的确定的时空观去解释自己的遭遇时,却往往以失败告终;第三,舍弃因果链。主观真实主义作品虽然采用历史事件,但它们与历史不同,历史追求的是各个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追求一种线性的连续性,而主观真实主义作品却并不致力于把各个孤立的事件连结成一个符合因果逻辑的整体。相反,它们任凭作品中的人物说出自己的独特经历。由于叙述者的观点彼此冲突,因果链被一再打破,并最终被彻底粉碎。因而主观真实主义作品的结尾是开放的。这样的结尾有效地挫败了读者从结尾中去推断整个故事的意义的努力。

在文学创作中,用全知叙述的手段提炼出一个因果链从而强化经过严密整合的牛顿的时空,背后起作用的事实是从一个优势视点对事物进行透视的原理。作者会安排自己或者作品中的某一个人物占据这个优势视点,以自身为中心,对周围的事件与人物进行安排。经过这样的加工,周围的人物与中心人物之间的关系远近分明,符合透视原理。事件之间也有一个明晰的线性的因果链条。但是,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人物。每个人都倾向于以自身为中心来看视其周围的世界,因而对同一个人、同一个事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解读也不尽相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把不同的人物与事件区分开来,人与人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影响,彼此制约。借用苏珊自己的一个比喻,如果把文学作品看作窗户,把现实看作花园,那么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作者引导读者通过窗户看花园,但主观真

现实主义小说“既承认窗户上的玻璃,也承认花园”(Strehle 5)。也就是说,作者引导读者既关注花园,也关注窗户上的玻璃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观看,并且注意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些被苏珊命名为主观现实主义的小说除了上述由苏珊所发掘出来的特征外,在形式上也表现出一些共性:篇幅庞大,结构芜杂,因而被有些文学评论家指责为“白象”,却在现实生活中颇有影响力,有的是畅销书,有的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列克莱尔提出用系统论来解释这些小说的“超常”之处:冗长的篇幅,超负荷的信息量,与线性时空观所养成的传统叙事迥然有别的叙事策略。

系统论带给世界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静态到动态,从实体到关系,从部分到整体,从单向到交互,从起源到目的,从非此即彼到两者皆可,从确定到不确定。^④在系统论的思维框架中,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个其中的各种因素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而不是万事万物的简单的叠加。借助系统论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列克莱尔以重新定义“经典”的方式来揭示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彼此介入。经典最初是指那些在文学史上富有影响力,而且经久不衰的作品,但是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的强势进攻下,经典逐渐变成了一个有贬义色彩的词。列克莱尔根据自己的批评实践依然决定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经典这个概念,但需要赋予它新的含义。他认为经典作品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可能性来呈现一个全球性的文化整体,创造性地充分利用各种叙事方式,对读者施加影响,即借助作品的声望把读者的注意力从个人的和地方的转移到社会的和全球的。这些品质就构成了列克莱尔所说的经典的三个标准:“洞晓自身所得以产生的现实世界;熟练掌握叙事策略;塑造读者”(LeClair 5)。

这些被有些评论家称为“白象”,而被列克莱尔列为经典的小说之所以结构庞大是因为它们就是从地球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中产生的。不仅如此,它们还要试图涵盖经济、政治、种族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这些方面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因而它们所呈现的信息对传统的读者来说是过量的;之所以在叙事上没有因果,逻辑断裂是因为我们所置身的现实就是“相对的、非连续的、能量的、统计的、主观的和不确定的”(Strehle 13)。这些经典小说在题材、叙事、

信息量等方面用力甚勤,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突破传统的能力,因而被称为“超常的艺术”是十分恰当的。它们因其新颖的形式和独特的内容而拥有了一种高超的修辞的力量,起到了不断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塑造读者并同时唤醒读者对自身所处的世界进行思考的作用。这些作品之所以要竭尽全力创新,显出“超常”特征,是因为美国文学和美国社会一样是一个竞技场。它们只有通过异常冗长的结构,灵活的叙事方式把社会生活中异常的事物展现出来,才能够凸显出自身,从而起到引领文化创新,重塑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读者,并进而达到帮助人类理解自身及周围环境的功能。

尽管列克莱尔的著作有些地方跳跃性较大,对个别作品的分析偶尔也有牵强之处,但是他采用系统论所给予经典的重新阐释在当下普遍认为经典衰落的语境下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且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艺术独特的实践性维度,通过塑造读者来介入现实。

采用信息论对美国当代小说的研究揭示出了文学作品是如何通过塑造读者来介入现实的。在一般的信息传递中,信息接受者一旦接受到信息,作为信息载体的那些可以被代码化的语言就消失了。具体到文本阅读,如果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那么一旦读者从中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知识,那么这个信息传递过程就结束了。但是阅读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独特的信息传递过程,却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读者的最重要的反馈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即时的。当然不可否认,一些即时的反馈,如书评、读者来信及销售量等等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文学文本而言,“真正的反馈本身是一些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指向读者,而不是顺原路返回到他们的作者的前任作者那里”(Paulson 148)。就是说,文学所开创的信息交流方式永远是面向未来的,也从来不会是一种固定的信息传递模式。其次,文学文本对读者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可以预见的。虽然很多人都承认阅读文学作品很有意义,有时候甚至会改变阅读者的生活,但是阅读文学作品却无法立刻见效,而在阅读之前也无法预知会有什么样的收获。阅读文学作品不像阅读培训手册或者指南之类的文本,可以获得能够立刻投入实际使用的知识。文学文本不提供实际问题的解答,而是“没有固定结尾的文化对话游

戏中的新的变化。”这场文化对话游戏不是通向一种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其中的每一个新的变化都导向未来。文学文本用语言对读者做的独特的事情,“不是与读者交流,而是影响读者,使新的交流成为可能”(Paulson 147-48)。也就是说,利用文学作品特有的唤起情感的力量影响读者,使其为接受新的文化代码做好准备。

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整个世界向信息社会高速前进。信息社会是一个电子化的地球村,在其中任何不能被转换为计算机语言的事物都面临着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的命运,文学就是其中的一种。与此相应,文学研究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边缘化。文学研究不仅受到文学本身萎缩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其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对人本身的研究以及对文化的研究已经不属于文学研究的领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使其脱离了早期的文本研究阶段而无法被纳入文学研究了。在这种现状下,更需要文学研究者做的不是诅咒现代科技,而是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文学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

在美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研究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文学批评,二是解释文本的意义。对文学研究的这两种功能的预设背后起作用的是这样一种认识,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是其他学科中的一种,可以被合法地划分为独立的领域,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于是,文学就成为一种事物,在特定的语境下可以用具体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因此,对文本、人、人的心灵的研究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理解势必会导致其他学科的发展对文学研究的强势压缩。而且把文学当作一种可以进行研究的实物,事实上也把文学研究自身放在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中。一方面要竭力使其成为一门受尊敬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平等;另一方面又要使人确信文学研究可以给所有人提供文化方面的通识教育,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使文学成为实证主义学科的研究对象,为此就要时时模仿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又要竭力传播文学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自然哲学、自然历史等的写作。由于实验科学越来越把文本转换为一种传递知识的手段,那些传统的被称为文学的写作丧失了一度拥

有的权威,并渐渐地从文学中被驱逐了。文学研究越是模仿科学,力图拥有固定的专属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成为一门学科,越是被科学的发展、学科的细化所压缩、排挤。因此目前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不是否定以前的研究方法,寻找新的更好的方法,而是变换文学研究的观念。变换观念的第一步就是重新认识文学在信息社会中的角色。

文学不是可以被代码化的传递信息的载体,而是创新之源。在传统的理解中,信息是可以被转换为代码而得到传递的,因此,文学与信息水火不容。在美国文学研究史上,在长达七十年的时间里,形式主义批评不停地灌输这样一种思想,文学文本的主要功能不是信息的载体,而是质疑我们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日常观点,因此对文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文学的文学性。人本主义者则把信息看作是外在于主体的一种事物,与主体相疏离,无法表达主体的那些个人性的、无法言喻的文学经验。对信息与文学的这种解读既是对文学的误读,也是对信息的误读。最早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和控制论思想推广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的人类学家、控制论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把信息定义为“能够创新的差异”(Paulson vii)。基于格里高利的这一定义,鲍尔森主张把文学理解为“不同要素组成的制造差异的系统”,所谓制造差异,其实就是创新。因此“文学文本既不代表自身之外且异于自身的事物,也不是自律的、自我指涉的单子,而是被建造出来的包含信息的事物,这一事物在一个同样是被建造的包含信息的世界里制造差异”(Paulson viii)。也就是说,文学是一个创新系统。它既不是包含着信息并且可以被代码化的消息,也不是一种实物,而是一个产生差异的源泉。正如信息论中的噪声一样,文学是文化中的噪声,在一个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通过对信息传递过程的部分阻断或者微扰来制造差异,从而达到促进创新的目的。

文学之所以能够作为文化中的噪声而对信息社会中海量流通、千篇一律的信息进行微扰,促进信息的创新,从而成为创新之源,是因为产生于当代社会中的那些真正具有美学价值的创新的作品由于其新奇的形式和内容而不能被读者完全接受,因而对信息传递构成了一种扰动或阻碍。而来自过去的那些经典作品,尽管它们中的一部分也许具有清晰简洁的形式及简单明了的内容,但

是由于它们来自过去,时间的长河改变了它们的文化代码,也带走了它们的语境以及它们互文的文本,因而依然构成了一种微扰。而那些用外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由于其新奇的语言,别样的思维方式,也可以促动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从而推动创新。

基于对文学的这一新认识,文学研究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把“过去”当作“现在”的他者呈现出来。虽然历史、科学史及艺术史等也研究过去的文本,但是这些学科需要有“历史”两个字来突出他们的研究对象,但是文学研究关注过去的文本这一特性却不需要用“历史”两个字来凸显,对过去的文本的研究就是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把由另外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当作本土文化的他者呈现出来。对文学的研究与对外语的研究是重叠的,只有在文学研究中,才有用外语来传递的关于异质文化的课程。尽管以法语、德语或者俄语写成的社会学、心理学或者数学等方面的著作被广泛阅读,但是没有诸如法国社会学、德国心理学,或者俄罗斯数学等之类的课程。并且,在阅读上述学科中以外语写成的著作时,语言本身被当作需要克服的障碍,因此重要的不是阅读这种语言的体验,而是通过掌握外语或者翻译等手段克服语言障碍之后获得信息。但是当以外语写成的文本以文学文本的方式呈现时,对于该文本的接受者而言,语言由于其他者性,本身成了一种目前还不能被代码化因而被完全接受的潜在信息的源泉。在文学研究中,文学、过去和他者是一同呈现的。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候,当那些既不是传达信息的交际工具,也不是当下的,也不是本土的书面文本被当作研究对象认真对待,而且这样的研究并非为理解过去的片段或某个方面而寻找证据,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置身于文学研究中了”(Paulson 152)。文学研究最主要的特征可以描述为一种严肃地对待对于当下给定的文明或者文化没有立竿见影的实际作用的文本的倾向。

对文学研究的上述描述也许会给人这样的印象,文学研究主要致力于研究一些边缘化的事物,或者那些虽然内在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或者文明,却并不能直接地进入该文明或者文化的信息流之中的作品。但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文学研究的这一边缘化的特性,我们才不会因为信息社会对文

学或者文学研究的排挤和压缩而惊慌。正因为文学和文学研究是处于一个文化系统边缘的微扰,是一种文化的噪声,因此它们才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创新之源。

三

尽管采用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一些自然科学术语的使用不是十分准确,行文方面有时候跳跃性较大,某些时候缺乏必要的逻辑论证等等。但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发掘出了文学对现实的影响力,及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独特作用,这一点对当下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在美国和中国的学术圈内,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挤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形成了一个颇为悲观的氛围。但本文中所提到的采用自然科学理论及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学者,却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对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颇为乐观的看法。在威尔森那里,“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不把对方的力量结合起来,都是不完整的。科学需要艺术的直觉和隐喻的力量,艺术需要从科学中吸取新鲜血液”(Wilson 211)。在苏珊那里,科学与文学相互交谈,在它们旁边有一扇玻璃窗,窗外面是一个花园。科学既观察窗户和花园,又观察它们对彼此的改变,同时还在观察科学自己在玻璃上的投影,思考它的视野是怎样被窗户玻璃塑造的。文学打破了玻璃,走了出去,从花园里采了一朵花,结果这朵花是一只玻璃水仙花。文学把花交给了科学,科学打破了玻璃,玻璃里面是一朵小一号的真正的水仙花。^⑤文学本着自己创新的特性,用想象不断为科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开启新的研究思路,而科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走向对生命的发现和保护。那些包裹在物质外壳里的生命才是科学与文学最后的目的。

对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乐观看法也促成了对于文学研究的独特功能的发现。文学是创新之源,尽管它们不能产生直接的、可以预见的效果,但是它们有影响和改变文化的潜能,还可以为人类和文化的进化开辟新的方向。因此,通过文学研究我们得到的不止是关于文学的知识,更重

要的是,我们在努力从文学艺术创造的这些可能世界中挖掘最好的那一个。同时也通过研究过去时代的文学文本,形成一股对当下的文化系统的扰动,促使其向着未来更为高级的阶段发展。

系统论、信息论等都是出自美国本土的理论,美国的文学批评家采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是在接受这些理论的过程中,这些批评家们也面临着挑战。

难以摆脱的还原论困境

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基因,还原论对美国文学研究界接受包括系统论在内的现代科学理论构成了一股阻力。还原论首先在生物学领域得到发展,从笛卡尔的“动物机器论”、拉美特里的“人类机器论”到牛顿时代的“一切生物都是机器”的论述,无不是还原论思想的体现。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原论思想逐渐突破了其狭隘的生物学意义而向其他自然科学的学科渗透。到二十世纪,还原论已经成了各门自然科学的重要原则。由于中世纪钟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基督教神学家开始把宇宙比喻为一个按照上帝的法则运行的大钟,这一比喻事实上是还原论思想在基督教中的体现。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及基督教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还原论几乎渗透到了西方文化的每一个领域,成为一种文化的基因。以至于在自然科学中系统论已经创建了几十年之后,深受还原论思维模式熏陶的文学批评家还是觉得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是那么难以摆脱,以至于“一开始思考系统,就会认为它是一些要素的集合”(Hayles 16)。但是所谓要素的集合只是我们的还原论思维模式的产物。还原论遮蔽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物理学法则只是对理想状态的简化的描述,而现实要比物理学法则所描述的复杂得多。如果从系统的观点来看,整个现实就是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与其所处的环境是一体的,但是深受还原论思维影响的生长于美国本土的文学研究者们对于分析的信仰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把自然环境当作人工制品,把要素的集合当作现实”(Hayles 17)。当柏拉图把理念置于万物之上,也就是把理想的抽象的事物置于千差万别的现实之上时,就注定了西方文化会处于今天的困境中。

与美国一样,中国文艺学界也是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把以系统论为主导的“新老三论”引入了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之中。但与美国的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文艺学界对系统论思维模式的接受迅速而彻底,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文学艺术研究中“处处是系统”的局面。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有机整体的世界观。如何更好地通过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来阐释这种世界观,以便彰显出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及意义,对处于还原论困境中的西方文明提供一种有益的补充,是中国文艺学界的学者大有可为的地方。

注释[Notes]

① 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该文通过对大量重要文献的引证,论述了后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后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量子物理学所证实。该文由《社会文本》发表。索卡尔随即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在该文中,作者披露他发表在《社会文本》上的那篇文章不过是一个实验,目的在于检测在美国学术界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用主观兴趣代替严密的论证。“索卡尔事件”引起知识界的极大轰动,被看作是一场发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战争。

② 海尔斯自2000年以来,就出版了*Writing Machines* (2002), *My Mother was a Computer: 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 (2005), *Electronic Literature: New Horizons for the Literary* (2008)等多部专著,主要研究电子信息技术与文学。鲍尔森(William R. Paulson)在2001年也出版了一部专著,*Literary Culture in a World Transformed: A Future for the Humanities*。在此书中,他进一步推进了自己关于在信息社会中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功能的思考。此外,还有其他学者也有专著,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③ 苏珊从海森堡(Heisenberg)的《物理学与哲学》(*Physics and Philosophy*)中关于可能和实在的论述中引出的一个概念,表述一种介于实际的事件和关于事件的观念之间的一种事物。取名主观真实主义(actualism)是为了表示其与现实主义(realism)既有亲缘关系又有区别。关于主观真实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可参阅Susan Strehle, *Fiction in the Quantum Universe*.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7-14.

④ 这里只是摘取了几个较有代表性的变化,关于更详细的论述,可以参阅Tom LeClair, *The Art of Excess: Master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7-9.

⑤ 该段论述请参阅 Susan Strehle. *Fiction in the Quantum Universe* .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236.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陈爱华 “混沌理论与美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国外社会科学》4(2011): 135—41。
[Chen , Aihua. “Chaos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 *Social Sciences Abroad* 4(2011): 135-41.]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Foucault ,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Trans. Mo Weimin.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Hayles , N. Katherine. *Chaos and Order: Complex Dynamics i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1991.

LeClair , Tom. *The Art of Excess: Master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Illinois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Paulson , R. William. *The Noise of Culture: Literary Texts in a World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伦纳德·史莱茵《艺术与物理学: 时空和光的艺术观和物理观》,暴永宁、吴伯泽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Shlain , Leonard. *Art & Physics: Parallel Visions in Space , Time , and Light*. Trans. Bao Yongning and Wu Boze.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Strehle , Susan. *Fiction in the Quantum Universe*.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Wilson , O. Edward.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Inc. ,1998.
(责任编辑: 王 峰)

